

目 录

前 言	(26)
第 一 章 五大重要古道的开凿	(26)
第一节 金 牛 道	(27)
第二节 石 门 道	(33)
第三节 清 溪 道	(42)
第四节 阴 平 道	(49)
第五节 瞿塘巫峡纤道	(54)
第六节 蜀 栈 道	(59)
第 二 章 古道的养护和管理	(62)
第 三 章 古道的分布	(69)
第一节 干线道路	(69)
第二节 支线道路	(72)
附 录	
一、 四川古道大事记	(75)
二、 四川重要古道简表	(81)

蜀道源辩

徐争青 撰述

“噫吁戏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。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？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。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，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，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缘。青泥何盘盘，百步九折萦岩峦；扞参历井仰胁息，以手抚膺坐长叹。问君西游何时还？畏途巉岩不可攀！但见悲鸟号古木，雄飞雌从绕林间。又闻子规啼夜月，愁空山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，使人听此凋朱颜。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绝壁。飞湍瀑流争喧豗，砢崖转石万壑雷。其险也若此，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！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所守或匪亲，化为狼与豺。朝避猛虎，夕避长蛇，磨牙吮血，杀人如麻。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，侧身西望长咨嗟！”

我们全文抄录下李白的《蜀道难》诗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的。李白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，从艺术角度来说，是不朽的。但是，他以浪漫主义色彩所渲染夸张了的“蜀道之难”，却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蜀道的全面理解和认识。自李诗问世以来的一千二百多

年，人们总是以“蜀道难”来概括四川古代的道路交通，以致使巴蜀先民为开发蜀道所付出的艰辛劳动、及其卓绝的发明创造，长期被泯没在这一偏见之中。至于蜀道起源，多以渺茫无稽为籍口，只好一直付诸阙如。这里，我们试以李诗为线索，辨考一下蜀道的本源。

一、蜀道“难”与“通”之辨

说“蜀道难”，实难在山川形势的险阻，故有“危乎高哉”之叹。若因“难”而谓蚕丛鱼凫开国以来“不与秦塞通人烟”，那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。自古以来，路就是人拓出来的，有人类必有道路，交通史是跟人类社会发史不可分割的。远在上古，四川盆地原有内海积水尚未完全泄走以前，蜀族的祖先就由西北青海高原向东南移进，来到川西北高原地带。从《史纪》可以看出这一活动的脉络。据《五帝本纪》记载：黄帝“西至于空桐”，在陇右，他有两个儿子，“青阳降居江水，昌意降居若水。昌意娶蜀山氏女”。降，就是下放的意思。《索隐》注：“江水、若水皆在蜀”。江水，即岷江；若水，今称雅砻江。蜀山，当指岷山。蜀山氏所在地，《元和郡县志》说在通化县，《太平寰宇记》说在石泉县，照现在的地理位置，那就是在茂汶、松潘之间的叠溪了，正好是后来蚕丛氏王蜀的地方，汉置为蚕陵县。

在这同时，巴族先民也由荆楚自东徂西，来到盆地的东部边缘。《山海经》说，“帝舜生无淫，降戡处，是谓巫戡民。巫戡民，盼姓”；又说，“巫盼居灵山”。按《说文》解字，“灵”和“巫”通，“灵山”就是“巫山”。《世本》又记“廩君之先，故出巫诞。……廩君名曰‘务相’，

姓巴民，……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，……君乎夷城”。“巫诞”，疑即“巫戟”。夷水，《水经注》说，“即佷山清江”，佷山位于现在湖北长阳县西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注引《荆州记》：“案今施州清江县水，一名盐水，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”。古都亭山，在今利川县西。夷水别出巴郡鱼复县，古与巫山黛溪相通。盐阳，就是盐水以北，巫山以南的地方，这一带分布有盐泉。夷城，即今湖北西部的恩施，古属巫县地。由此得知，廩君巴务相是由湖北长阳、宜都地区，溯清江西上而达四川东部的巫山境内。

这些记述，尽管零星片断，但大体勾画出古代巴蜀两大部族进入四川盆地过程中，所循方向、路线，以及所开拓的交通区域。这同近年来四川省的考古发现，也是基本吻合的。1964年在阿坝自治州的理县汶川的杂谷脑河和岷江会合处，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，石斧、石凿都是西北黄河上游流行的一类石器，彩陶和泥陶具有甘肃的仰韶文化的风格和特征，经考古鉴定为仰韶文化系。1959年巫山大溪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出土的彩陶类似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，黑陶具有龙山文化特点；石制工具除石斧、石锛、石凿、石镞外，还有石锄、纺轮、骨针，表明有了农业和纺织。遗物中还有玉璜、玉玦、绿松石耳坠等玉制装饰品，显然是外地输入之物。

根据考古测定，理县汶川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陶器，属于仰韶文化系中的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，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上游，断代为公元前2600年上下。它表明岷江中上游和黄河中上游这两个地区，是有着历史联系的。蜀族进入川西北后，早期活动区域就在岷江中上游一带。从遗物的历史年代来推算，公元前2600年也接近于《史记》所说“昌意娶蜀山氏女”的时期。这一科学见证，完全

解开了“不通人烟”之谜。

巫山大溪的新石器时代遗物，包含了仰韶、龙山、屈家岭三个文化系。龙山文化，分布在黄河中下游。屈家岭文化，主要在江汉平原，断代为公元前2400年至2300年之间。《山海经》说虞舜把儿子无淫下放到巫载，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引孔安国说：“舜所居妫水之汭”。“妫汭”，就是现在山西省永济县的蒲州镇，位于黄河中下游弯曲处。这就说明大溪文化同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有着渊源关系。巴人自荆楚江汉地区，迁徙到长江三峡地区的时候，就已经形成一条传播屈家岭文化的交通。从历史年代上推测，居住在巫山大溪的巴族，同江汉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往，应该始于虞夏之世，也就是公元前2400年至2300年，正与出土遗物所考定的年代相扣合。

那么，蜀和巴这两个部族进入四川盆地以后，交通情况又是怎样呢？曾经有人认为：周失纲纪，也就是到春秋时期，或者还要更早一些，蜀的史事不见记载了，自此蜀便与中国隔绝起来。《禹贡锥指》反映过这种看法：

“夏殷之际，梁俗变为蛮夷，贡职不修，贡道遂废。周

武王牧野之师，八国虽尝来会，其后巴蜀恃险，复不与中国通。”成都《尊经书院二集》，还反映了“不通中国之说”的原由：

“(周室)东迁都洛以后，王令不行于郊。秦有丰镐，蜀贡隔绝，无由远达。既绝于周，义不归秦，于是闭关自王，保土息民，以覃国祚。当是时，辀轩迹息，赴告道阻，蜀之名不见春秋。此不通中国之说，所由起也。”
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仅就交通的角度，援引史实，略加考证。

《汉书·礼乐志》记载：

“至成帝时，犍为郡于水滨，得古磬十六枚。”

古磬出土，可作古蜀交通的见证。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说，是在成帝绥和元年冬发现的。犍为郡治，当时已移至武阳，出土地点就在武阳河边，今彭山县东，即秦伐蜀时，开明王被杀之处。《初学记》引《三礼图》：“凡磬十六枚同一龔虞，谓之编磬”。所得恰是一组编磬。古乐史，殷以磬为主，周以钟为主，则西汉武阳出土的这组编磬，显然是殷代的打击乐器，很可能就是那个时期由殷地传入蜀中的。

从现代的考古发现，更能说明“不通中国之说”，是讲不通的。

其一，据四川省博物馆的《四川新繁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》：在1957年和1958年的两次试掘中，从早期墓葬清理出的三件铜戈，其形制与河南郑州二里岗殷代墓出土戈相同；

其二，又见王家佑的《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》：1959年在彭县东四十华里的竹瓦街发现的铜器中，有两件青铜觶，底部镂刻的铭文全是殷人作风，一曰“牧正父己”，一曰“羊(羌)父癸”，字体与商及周初的金文体一样。出土的铜兵器中，有戈、戟、矛、铍，都不同于四川出土的战国早期兵器，显系自外地传入；铜器的制作时代，约为殷末周初；

其三，又据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在1962年对《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》：出土的陶器上的云雷纹，是中原殷周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；石器中的璧、圭、璋等礼器，也为中原周人的作风，其年代居于西周期间。

这三处出土地点，相邻很近，彭县和新繁都属汉新繁县地，中兴

距竹瓦街只有十二公里，出土器物又同属殷周时代的作品，足以说明这个时期的蜀同中原的交往是相当密切的。彭县地区，是鱼凫和杜宇时代的都邑。《蜀王本记》说：“鱼凫田于湔山”，可知蜀族进入成都平原，是在鱼凫时代。试以秦灭蜀于公元前316年往上推算：开明氏时代照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说“王蜀十二世”，《路史·余论》说“肇令王蜀……三百五十年”，应为公元前666年至316年，历春秋、战国两个时期。杜宇氏时代，《蜀王本记》谓“望帝积百余岁”，以五世计，各王三十年，约为一百五十年，相当于公元前816年至666年，始于西周宣王中兴之世。蚕丛、柏灌、鱼凫三个时代，《蜀纪》说“此三代各数百岁”，如果平均各传十五世，按三十年为一世计，每代约为四百五十年左右，推测鱼凫氏进入盆地的期间，约为公元前1266年至816年，正当殷朝战争频繁、远征异族的年代，殷的军事势力已达地处西南的蜀。如此看来，鱼凫族的主要活动时期当在殷周之际，该不会有多大误差。这就有充分的依据作见证，西汉犍为郡出土的殷代古磬，近年来先后在彭县、新繁、广汉等地发现的殷周铜器，都是在鱼凫和杜宇时代引进蜀地。《华阳国志》说的“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”，也是足以征信的。可见三、四千年前的巴蜀人，确实已经打通秦岭和大巴山的隔绝，开拓了同华夏地区的交通。因此，澄清秦灭巴蜀之后，四川始与中原有交通的说法，是完全必要的。

至于春秋时期，蜀道交通也根本不存在阻隔这回事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得很清楚，“及秦文、德、繆居雍，隙陇、蜀之货物而多贾”。秦文公元年为公元前765年，即周平王东迁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的前六年，正当春秋初期；繆公，即穆公，其末年为公元前621

年，周襄王三十一年。文、德、穆三代，秦国都邑均在雍地，就是现在陕西凤翔县的南边，前后一百四十四年。这段时间，蜀正处于杜宇时代和开明之初。陇在雍的西边，蜀在雍的南方。因为陇上东来，由蜀北往的货物，都要在秦都雍邑集散，雍成了陇、蜀与秦之间的要路和贸易中心，所以言“隙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蜀往雍虽然中间横隔秦岭，还能“货物多贾”，这不仅反映了两地商业往来的盛况，而且说明了在春秋时期，蜀秦之间的商贸交通是十分发达的。也正是这一商路，为以后秦汉这两代帝国开发巴蜀，经略西南打下了基础。

二、“太白鸟道”与褒斜谷道的关系

李诗言道：“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”。这“太白鸟道”与蜀道有什么关系呢？常璩在《华阳国志·序志》中说：

“《蜀记》言三皇乘祗车出谷口。秦宓曰：今之斜谷也。及武王伐纣，蜀亦从行；《史记》周贞王之十六年，秦厉公城南郑，此谷道之通，久矣！”

所谓“三皇乘祗车出谷口”，这一传说是不可靠的，因为三皇之世还没有发明车子。但有一点可以相信，蜀从武王伐纣和秦厉公城南郑，都是走的秦宓所说的斜谷道。这条谷道，在蜀汉时已成为重要的军事交通。秦宓系汉绵竹人，是蜀汉有名的博学之士，他的话是有根据的。从地理位置上判断，“太白鸟道”就是斜谷道，这是一条开辟最早的穿越秦岭的蜀道，绝不是什么“唯飞鸟过此”，“人迹所不能至”的“径路”。

斜谷，是褒斜道的一部份。有不少关于这谷道的记述，可见它

的重要性。

西汉褚先生补《史记》说：“武功、扶风西界小邑，蜀口栈道近山”。汉武功县，在今陕西郿县界，属右扶风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谓：武功有太一山。由此而知，“小邑”即郿县，近山的蜀口栈道，指靠近太一山的斜谷。

唐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志》中指出：由汉中“北取太白山路，至凤翔府六百里”。据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：郿县，唐属凤翔府，有太白山。因此，“太白山路”就是褚先生说的近山的蜀口栈道。

清胡渭的《禹贡锥指》说：“郿县为太一山，亦名太白山，骆谷、斜谷之口，皆当其地”。又说：“斜谷口，在郿县西南三十里”。这就进一步说明，“太白鸟道”、太白山路、斜谷道，就是褒斜道。

因此，清查郎阿所修的《陕西通志》明确地说：“褒斜在长安西南，南口褒，北口斜，长四百七十里。郿县城，亦曰‘斜城’，城南当斜谷，因以为名；秦宓曰‘斜谷’。”据《北周地理志》，“斜城”在今陕西郿县城关。这都印证了秦宓所说。

太白山，是秦岭的主峰。秦岭山顶宽阔，东西相连，成为一齐整的海拔3000米的峰顶线。峰顶两侧，河流分向南北，造成若干山口，被古代巴蜀人开拓为重要交通孔道。其中褒、斜二水，同出太白山。褒、斜中间，隔一狭隘的分水岭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称作“衙岭”，俗呼“马鞍山”。斜水自衙岭北流，至郿县注渭水；褒水由衙岭南流，至南郑入汉水。衙岭在郿县西南三十里，也即斜谷口；褒谷口，在褒城县北十里。褒斜二谷甚长，分水岭地较短，所以褒斜道大部沿着谷道前进。又由于处在渭河断层地带，山峰偏于北面，两侧坡度北陡而南缓，这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，使褒斜道在汉以

前，一直是通过秦岭、连络蜀秦的唯一交通大道。

然而，李白所描绘的“太白鸟道”。不单是秦蜀之间的一条大道，还“可以横绝峨眉巅”，更远地伸向蜀中腹地。峨眉山，晋左思《蜀都赋》有“抗峨眉之重阻”句，唐《十道志》把它列为剑南道的名山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益州记》说：“峨眉山在南安县界”。南安县，为西汉所置。《水经·江水注》说：“县治青衣江会，衿带二水，即蜀王开明故治”。现在的乐山、夹江、峨眉，都是汉南安县地。“太白鸟道”确实通到了峨眉山，而且在开明初期，甚至还要更早一些就通了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载：

“开明位，号曰丛帝。丛帝生卢帝，卢帝攻秦至雍；生保子帝，帝攻青衣，雄长獠獼。”

丛帝王蜀始于公元前666年，卢帝为开明二世，攻秦时间没有文献可征。照司马迁所说，“秦文、德、繆居雍”，文、德两代为公元前765年至676年，都在开明王蜀以前，则卢帝攻秦时，可能正是秦穆（繆）公居雍的期间，约当公元前630年左右，也即春秋中期。三世保子帝攻的青衣国，就在青衣江一带，即“青衣羌地”；獠、獼活动地区，相当乐山东南，岷江下游至宜宾附近。可以看出，开明二、三两世的蜀国，已经是个军事强国，在南征北战和扩张疆土的同时，也使蜀道交通得到扩展，北达秦国都邑的雍境，南抵宜宾长江两岸的獠獼地区。这条横越秦岭、大巴山，贯通蜀中腹地的交通线路，包含了褒斜谷道和石牛道前身的古道，正是古蜀早期沟通中原的干道雏型。因此，三千多年前在殷和西周的京畿附近铸造的青铜器，才有可能输入到蜀王都邑所在地区，并发展着蜀国同中原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。象这样的交通业绩，“鸟道”安能完成！

三、蜀道非因石牛始通

“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。”这意思很明显，是说“五丁开道”之后，梯栈相连，石牛道成，蜀始与秦相通。

这一观点，常璩作《华阳国志·序言》时，就曾经表示不同意：

“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，不然也”。有关石牛道来历的记述，最早的是西汉杨雄的《蜀王本纪》。但《蜀纪》失传已久，现在能见到的只有后人辑本，仍可作清理石牛道眉目的凭据。清王谟所辑的《蜀纪》，对石牛道是这样记载的：

“秦惠王时，蜀王不降秦，秦亦无道出蜀。蜀王从万余人，猎褒谷，卒见秦惠王。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，蜀王报以礼物，礼物尽化为土。秦王大怒，臣下皆再拜稽首，贺曰：‘土者，地也。秦当得蜀矣！’

“相见处，乃刻石牛，置金其后。蜀人见之，以为牛能大便金。蜀王以为然，即发卒千人，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，置三枚于武都。秦道乃得通，石牛之力也，后遣丞相张仪等，从石牛道伐蜀。”

《蜀纪》所记，有不少扞格牴牾之处。既然蜀王到褒谷打猎时遇见秦惠王，那就是有道进出秦蜀；说“秦无道出蜀”，是不合情理的。比杨雄晚三百年的晋代常璩，在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中又作了如下记述：

“周显王之世，蜀王有褒汉之地，因猎谷中，与秦惠王遇。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，王报珍玩之物。物化为土，惠王怒，群臣贺曰：‘天承有矣，王将得蜀土地！’惠王喜，乃

作石牛五头，朝泻金其后，曰牛便金，有养卒百人。蜀人悦之，使使请石牛，惠王许之，乃遣五丁迎石牛。既不便金，怒遣还之，乃嘲秦人，曰东方牧犊儿。秦人笑之曰：吾虽牧犊，当得蜀也！”

常璩在这里补充了石牛之事发生在周显王时期，点出褒汉之地属蜀所有。但是，他回避了开石牛道，而是在叙述秦伐蜀时说：

“周慎王五年秋，秦大夫张仪、司马错、都尉墨等，从石牛道伐蜀。”

这就呼应了他在《序志》中所说：“此谷道之通，久矣！”同时，暗示“石牛道”实因石牛而得名，并非因石牛始通。

与常璩同代，当过北魏秘书考课郎中的阚骃，所著《十三州志》又是一种说法：

“昔，蜀王从卒数千，出猎于褒谷。秦惠王亦畋于山中，怪而问之，以金一筐遗蜀王。及报欺之以土，秦王大怒，其臣曰：此秦得土之端也。

“秦王未知蜀道，乃刻石牛五头，置金于尾下，伪如养之者，言此天牛，能屎金。蜀人见而信，乃令五丁共引牛成道，致之成都。秦因知蜀道，而亡蜀。”

照阚骃说，秦本不知蜀道路线，所以秦王在山中见到蜀王也来打猎，感到奇怪，打听蜀王从何而来，于是设下石牛屎金圈套，摸请了蜀道底细。不是“秦无道出蜀”，而是有道秦不得知。

杨雄、常璩、阚骃所述，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前提，即秦蜀之间早有谷道相通，因而秦蜀二王才能共猎于褒谷之中。但是，唐魏王李泰等所撰《括地志》，对石牛道原由的记述，却有很大不同之处：

“褒谷在梁州褒城县北五十里南中山。昔秦欲伐蜀，路无由入，乃刻石为牛五头，置金于后，伪言此牛能屎金，以遗蜀。蜀侯贪信之，乃令五丁共引牛，凿山堙谷，致之成都。秦遂寻道伐之，因号曰‘石牛道’。”

《括地志》根本不提蜀王与秦王在褒谷相逢一事，把前提修改为“路无由入”，否定了常璩的“谷道之通久矣”的论点，强调“凿山堙谷”，新开石牛道。《括地志》的观点，正反映了唐时对蜀道起源的流行看法。

北宋司马光主编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没有取《括地志》的说法，在《周纪》只提“秦惠王欲伐蜀，以为道险阨难至”。可见司马光并不认为“路无由入”，而是说秦惠文王想侵略蜀国土地，愁的是蜀道崎岖狭隘，不容易进兵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秦才处心积虑地诱骗蜀人拖引石牛，假蜀人之手，开宽原有山路，使秦军得以循着石牛经过的路线，长驱直入，一举亡蜀。这条路也因此命名为“石牛道”。

石牛道就是在原来山路的基础上开拓而成的，这是有事实根据的。常璩所说“此谷道之通久矣”，也是否定不了的。史书有正式记载的秦蜀交通，从秦厉公二年至秦惠文王元年的一百三十八年间，也即蜀的开明时代，就发生六起重大事件：

秦厉公二年，蜀人来赂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，公元前475年）；

秦厉公二十六年，秦左庶长城南郑（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，公元前451年）；

秦躁公二年，南郑反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，公元前441年）；

秦惠公十三年，秦伐蜀，取南郑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公元前

387年)；

秦惠公十三年，蜀取我南郑（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，公元前387元）；

秦惠文王元年，楚、韩、赵、蜀人来朝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，公元前337年）。

这六起重大交通，涉及南郑的就有四起。南郑地方，《蜀鉴》说：“本古褒国”。《国语》说：“周幽王伐有褒，褒人以褒姒女焉”。此即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所记：周幽王三年娶褒姒一事。郑桓公三十六年，在犬戎攻周时被杀，郑民南奔至褒地定居，因名“南郑”，以后并为蜀地。所以，《华阳国志》说：蜀“以褒斜为前门”，“蜀王有褒汉之地”。汉中来历，据《水经·沔水注》：周赧王二年，秦惠文王置汉中郡，因汉水而名。这是秦灭蜀后三年之事。褒谷，在褒水上游，位于太白和留坝之间，是一片开阔的森林地带，谷道即由此通过。从这些历史记录看，秦蜀交通早在“石牛”之前就发生了，确实是“谷道之通久矣”。由于秦岭以南谷道沿线都是蜀地，道路为蜀人所开，因此，褚少孙称“蜀口栈道近山”。秦对蜀域山川地形和蜀道路线情势不清楚，《十三州志》说“秦王未知蜀道”，这本是合乎情理的。

四、 栈道的创举

栈道，是蜀道所独具的特征。栈道始创于何时，穴山架木用的什么工具，虽无文献可考，但可以肯定，栈道交通首先出现于古代巴蜀区域，是巴蜀先民对付山路的一大创举。

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：

“及秦文、德、繆居雍，隙陇、蜀之货物而多贾。

“巴蜀亦沃野，地饶卮、姜、丹砂、石、铜、铁、竹、木之器。南御滇焚、僰僮。西近邛笮，笮马、旄牛。然四塞，栈道千里，无所不通，唯褒斜绾毂其口，以所多易所鲜。”

司马迁对栈道出现的时代、地区、路线、用途，都讲得很清楚。栈道交通创始，最迟不晚于春秋时期，也就是蜀的杜宇时代。常璩说：“杜宇教民务农。……巴亦化其教，而力农务”。这时的蜀，已定居的成都平原，致力农业的发展。随着农业生产上升，“以所多易所鲜”的经济交换也繁盛起来，所以秦文、德、繆时，“隙陇、蜀之货物而多贾”。这种贸易活动范围的扩大，原来的山径小路，已不再适应物资运输的需要，迫切要求变革交通。这就是栈道交通兴起的重要因素。当时蜀的疆域，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说：“其地东接于巴，南接于越，北与秦分，西奄峨嵋”。关中南面隔着的秦岭和巴山，都是巴蜀地方，千里栈道就分布在这“四塞”之国。

《战国策·秦策·蔡泽见逐于赵》所记蔡泽同范雎的对话：“栈道千里，通于蜀汉，使天下皆畏秦”。这是秦惠文王灭巴蜀后六十年的事情。秦昭王四十一年（公元前266年），范雎出任秦相；蔡泽见范雎，是在昭王五十二年，即公元前255年，距秦文、德、穆三、四百年。司马迁说的是巴蜀在春秋期间交通状况；蔡泽所指“栈道千里”，已是巴蜀灭亡后属于秦国的交通。二者含义，根本不同。蒙文通在《巴蜀史的问题》一书中指出：“蔡泽说范雎相秦，‘栈道千里，通于蜀汉’，这是整理交通”。说得很对，确实如此。

栈道交通，是否始于蜀？清张澍有不同看法，他在《蜀典》中说：

“《战国策》：田单为栈道木阁，迎齐王（与）后于城阳山中；《史记·高祖（本）纪》：辄烧绝栈道，〈索隐〉引崔浩云：‘险绝之处，旁凿山崖，而施版梁为阁’也。是栈阁，古即有之，不始蜀之栈阁也。”

“又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：延楼栈道，鸡栖井干。是栈道，官室亦有之。”

张澍所举三例，不足以证明他自己的结论。

1、齐田单所作栈道木阁，不是以开发山区交通为目的，而是专为接回逃到城阳山中避难的齐襄王及君王后。城阳山，在今山东莒县，战国时为城阳国。此事发生于周赧王三十六年（公元前279年），比整治石牛道后秦伐蜀要晚三十七年。

2、汉王刘邦回南郑，烧绝所过栈道，是在公元前206年，烧的是褒谷栈道。蜀有褒汉之地，褒斜道正是最早的蜀道。

3、《淮南子》一书，是汉武帝时，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著的。《本经训》所谓“延楼栈道，鸡栖井干”，都是指秦阿房宫和汉宫内的建筑。高诱注《淮南子》：“延楼，高楼也；栈道，飞阁复道相通”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始皇作阿房宫，“周驰为阁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”。《正义》注：阁道，“飞阁之道，天子欲游别宫之道”。《集解》说：复道，“上下有道，故谓之复道”，也即“阁道”。“井干”，《汉书·郊祀志》记：武帝作建章宫，

“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。立神明台、井干楼，高五十丈，辇道相属焉”。颜师古注：“井干楼积木而高，为楼若井干之形也。井干者，井上木栏也，其形或四角，或八角”。“鸡栖”，《诗经》有“鸡栖于埘”句，汉宫殿中，有“鸡栖树”，后借指中书官署。这

些官庭之物，与蜀的栈道交通根本无关。

栈道交通，之所以最先出现在巴蜀疆土上，这同自然地理条件和古代巴蜀习俗密切相关。红色盆地出现之前，秦岭和大巴山，对古代巴蜀与中原地区的联系，是很大的障壁；红色盆地呈现以后，周围崇山峻岭，形成一个“四塞”之地。当时的道路交通，在有河谷可循的地带，辟成谷道；遇无路可通的绝壁悬崖，便穴山架木，修建栈道，就是崔浩所说：“险绝之处，旁凿山崖，而施版梁为阁”。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，不可能凿山开路，而在峭壁上凿孔架栈，或在悬崖之间横木搭桥，倒是简易可行。因能就地取材，新建整修，都较方便。古代蜀族，善长凿石穴山之技。《古文苑》引《先蜀纪》说：“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”。《华阳国志》说：“蜀侯蚕丛，其目纵，始称王，死作石棺石槨，国人从之。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”。蚕丛氏约当夏代，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期，是否具备开采岩石，制作石棺石槨的技术条件，有待考古印证。但是，从蜀族生居石室、死作石棺的传说，联系栈道交通的创始，是会发现很多有意义的线索的。

李冰任蜀郡守时，曾用“积薪烧石”之法，治理过犍道江中一座大滩。《水经注》说，其滩“崖峻阻险，不可穿凿”。但是经过木柴焚烧，趁热浇上冷水，热石突然受冷，便会爆裂，再施以斧斤，很容易凿开。这个办法，完全符合热胀冷缩的科学原理，绝不是李冰个人一时的创造发明，必然是蜀族先人在与石头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，积累起来的一种凿石穴山的经验。

砍伐树木的经验，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。一般都是用火焚烧树的根部，再用石斧砍断。修建栈道所需的木桩、木橧，是容易取得